

红色经典教育的社会学反思

■韩春萌 韩思齐

摘要: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红色经典”曾经哺育过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变迁、亚文化、“麦当劳化”等因素,使红色经典面临着多方面的冲击。要发挥其独特的“育人”功能,就不能不从教育社会学和文艺社会学的角度,对红色经典教育进行必要的反思。

关键词:红色经典;教育代沟;亚文化;“麦当劳化”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课题《当代红色经典教育的对策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二,课题编号09YB137。

作者简介:韩春萌,男,江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江西南昌 330029);韩思齐,女,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上海 210000)。

“红色经典”又称“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的是从1921年至今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狭义上的仅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包括文革“样板戏”在内的革命历史文学。本文研究的是广义范围的“红色经典”,包括当代新创作的影响较大的《亮剑》、《潜伏》等“准经典”在内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红色经典”在思想教育上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激励着许多人成长与奋进。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由于诸多原因,今天的“红色经典”却与青年一代有着很深的代沟,其社会教育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社会是一个由众多因素构成的错综复杂的机体,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分析当前红色经典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红色经典的社会教育功能。

一、社会变迁与经典教育求变适应

社会变迁,带来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同样也带来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红色经典教育作为文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面临着新的挑战。前苏联有一大批红色经典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青年近卫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过去曾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与人生观教育的生动教材,在前苏联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前苏联的解体,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之后,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对红色经典地位的认识也不同了,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剔出文学史、《青年近卫军》也只有轻描淡写的一笔。在我国,近年来也发生了一系列类似的事件,影响最大的是小学课文《狼牙

山五壮士》被部分省市从新教材中删除,引起社会各界轩然大波。

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反映,“社会变迁在先,教育是一种适应性的制度。社会变迁是因,教育适应是果。即当社会的某个方面出现变革时,教育必然会出现功能性的适应性调整和变化,教育是社会变迁的结果。”^[1]根据社会学中这种“教育适应论”观点,时代不同了,红色经典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要改变,这样才能适应当前的教育形势。

一方面,要加强红色经典教育的内部改革,在红色经典教育的内容上,要尽可能地加以拓宽。在众多反映革命历史的文学作品中,过去主要是围绕“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这几部经典来进行教育教学与研究,范围较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2],即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其他“红色经典”,如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冯德英的《苦菜花》等只是提一下。这些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除《创业史》、《山乡巨变》反映的是土改及建立农村初级合作社外,其他作品内容上几乎全是战争题材的。从体裁上看也比较单调,几乎是清一色的长篇小说。既然广义的“红色经典”是从党成立至今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还有很多作品可以挖掘。如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及后来的解放区文学等。以解放区文学中的《王贵与李香

香》为例,这部描写革命青年的爱情长诗,青年人就很喜欢。通过红色经典作品的挖掘,进一步拓展其内涵,以期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另一方面,要加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对接,使红色经典教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是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即学校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如校方与家长、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等。把教育当作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来研究,对于红色经典教育存在的问题,就不能孤立对待。教育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教育与社会化过程的关系,研究各类教育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功能,并对有关的角色结构进行分析。鉴于此,在红色经典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鼓励和引导学生看红色经典,给他们讲自己的学习体会;在学校教育中,可以结合所学的课文,经常性地开展一些与红色经典相关的读书活动。在社会教育中,可以请革命前辈来现身教育,如请《红色娘子军》现在健在的老红军讲当年故事;也可与红色经典教育相结合,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红色经典改编与亚文化的颠覆

在多元价值观的竞争中,红色经典不敌“雷、囧、山寨”等草根文化,最终几乎被亚文化所颠覆。亚文化的不断渗透,也影响到红色经典的创作与改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不断强调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今天,同样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交融社会出现,不同价值观、社会思维和行为取向也随之产生,形成了不少亚文化。亚文化包括在任何文化模式上不同于社会其他部分的人群分支。它在很大程度上拒斥主流社会价值观和规范群体,能够激发替代主流文化的观念。“雷、囧、山寨”等草根文化就属于网络亚文化。由于其平民化和普及化,得到许多人的主要文化认同,但却不乏其负面影响。许多红色经典正是被这种价值观所颠覆,使得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的生涯遭戏说,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被篡改,许多青少年却以此为娱乐方式。

在红色经典的传承过程中,红色经典的改编也是一大缺失。名为《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和《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两部短片,在网上广为流传。在《参赛记》中,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鳄”,而潘冬子的母亲则一心想参加“非常6+1”。整部片子,甚至还夹杂一些不健康的对白。^[3]

在市场指挥棒左右下,一大批红色经典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如《平原游击队》、《苦菜花》、《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鸡毛信》等,但这些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林海雪原》被改成电视连续剧,其中对杨子荣形象加进了他不真实的恋爱故事和一些“有损”于他光辉形象的内容,引发了杨子荣的养子状告剧组的官司。改变红色经典的内容,破坏原著的原汁原味,这种缺失是难以弥补

的。

亚文化走向极致,便成了反文化。“反文化”是美国社会学家T·罗扎克提出的社会学术语,指的是西方青年所奉行的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4]这种反文化对社会的负作用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它有顽强的渗透力。如果它扩散到许多青年个体和群体中去,即使暂时不出现明显的越轨行为,也将大大削弱青年人参与社会建设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第二,它具有行为的诱导性。意志薄弱的青少年倘若长期处在反文化环境中,极易以破坏、暴力等形式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局势。”^[5]

亚文化、反文化对红色经典的颠覆,是一种文化病象,引起了社会各界不少人的关注。针对当前的“经典”改编热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温儒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对经典解构与颠覆的倾向不可等闲视之。对权威与传统的轻蔑、歪曲与亵渎,并和商业操作结盟,导致社会‘恶搞’成风,是一种文化病象。”^[6]

要制止亚文化对红色经典的解构与颠覆,必须加强对红色经典改编的管理,严把红色经典改编的质量关、审批关。

三、“麦当劳化”与新经典的匮乏

“麦当劳化”理论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乔治·里泽尔的著名社会学畅销书《麦当劳梦魇——社会的麦当劳化》^[7],其源头是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理论,里泽尔对它进行了现代化重构,而形成了这个新颖的理论模型。麦当劳是美国著名的快餐企业,所谓“麦当劳化”,指的是快餐店的规则逐渐主宰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乃至世界其他地域的过程。^[8]这个过程由于其极强的高效性、商业性和可复制性而主宰了世界,然而在这种理性的引导下,社会衍生出了非理性。目前中国红色经典文化大批量的生产,正是经历着这种“麦当劳化”。其具体表现为:

其一,高效性。社会学意义上的“高效性”,指的是为了与现代生活节奏相适应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其手法就是流水线生产和简化产品。如今,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数量不少,产量飞快,但是由于从剧本到拍摄的流水线化生产,把工业生产的方式运用到了文学影视创作中,使得作品出现各种纰漏、不符合常识、人物塑造不丰满、雷同状况。

红色经典作为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其发展过程所遇到的问题不能不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寻找原因。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所引发的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红色经典的发展困境。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社会描述那样,理性化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看似铁面无私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但繁文缛节的管理模式、对量化标准的过度强调和非人性化的控制技术使得生产效率并不能得到保持,“那些被假定具备高度理性化的操作通常以极端的非理性化告终。”^[9]

影视作品的创作者为了与紧张的现代生活节奏相适应而不断提高创作速度,试图达到高效。然而,其手法

却是流水线生产和简化作品。如今,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数量特多,生产飞快,以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为例,仅最近两三年就有《生死线》、《父亲的战争》、《滇西1944》、《我的团长我的团》、《为了新中国前进》、《神枪手》、《我的兄弟叫顺溜》、《身份的证明》、《沂蒙》、《江城令》、《勇者无敌》、《追杀横路靖六》、《狙击手》、《中国兄弟连》、《地上地下》、《潜伏》、《敌营十八年》、《谍战古山塘》、《战地浪漫曲》、《战火中青春》、《翡翠凤凰》、《十三省》、《战后之战》、《苍茫天山》、《决战黎明》、《南下》、《战北平》、《北平战与和》等等,这些剧作至少是二三十集,甚至是四五十集的连续剧,其生产出来的时间之快,有的简直难以令人置信。

其二,可复制性。正如“全世界的麦当劳可以提供质量均一的美食”,麦当劳化的红色经典创作也出现了极强的复制性。一部作品出炉后变得红火,马上会出现一批换汤不换药的仿作。如《我的兄弟叫顺溜》塑造了一个神枪手顺溜,《神枪手》跟着就有了彭克虎,《狙击手》中跟着就有了龙绍钦;《战北平》与《北平战与和》内容相差无几,推出的时间也相差无几;《亮剑》塑造了一位个性突出、不按常理出牌的李云龙,《狼毒花》也跟着塑造了一位缺点满身、桀骜不驯的常发。《潜伏》在市场上掀起收视热潮后,就有《地上地下》和重拍的《敌营十八年》等一大批谍战剧跟风而上。这种跟风现象导致了市场整体的创作性下降,形成固定的剧情发展模式 and 人物性格,造成了观众和读者的审美疲劳和反感心理。

艺术创作这一本应展现不同创作者独特的才情和迥异的人生经历的领域,被麦当劳化的生产方式所侵袭,把作品的创作等同于大工业生产,导致了非理性的后果。由于“麦当劳化”的侵袭,导致了当代红色经典的创作“经典”变得匮乏,更谈不上具有“史诗性”的作品问世了。

四、个体社会化与文艺的传播控制

个体社会化已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及其他许多学科共同关心的课题。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个体社会化是指个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学习与内化社会文化而胜任社会所期待、承担的角色,并相应地发展自己个性的过程。”^[10]要充分发挥红色经典的社会教育作用,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文艺的社会传播与对文艺的社会控制。

1. 加强红色经典的社会传播

围绕红色经典教育的相关问题,我们曾进行过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85.6%的人认为红色经典作品的传播途径越来越狭窄,方式越来越单调,是红色经典的社会教育作用受限制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的中小学课本中,红色经典作品及其相关课文越来越少。全国政协委员艾克拜尔·米吉提建议让红色经典回归中小学语文课本。^[11]当前比较多地接触红色经典作品的,只有高校中文系学生,他们在《当代文学》课程中对此有所涉猎。对于全社会来说,仅有部分高校中文系学生接触红色经典,这种传播范围毕竟太狭窄了!

红色经典必须向全社会传播。“文艺的社会传播,是文艺通过一定的大众媒介在社会上传递、散布的过程。”^[12]红色经典向社会传播,当前主要是靠影视作品。红色经典图书的出版与阅读活动的倡导,近年来也是少而又少。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加强红色经典的社会传播,除了加大影视方面的传播,还可以充分发挥网络这个新平台的重大作用;可以围绕红色经典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活动,加强红色经典向社会的传播。

2. 规范作家的个体创作行为

作家是个群体,就单个作家而言,又是个体。作为个体的作家,同样面临社会化问题。“个体社会化过程不仅是一个接受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的过程,还是一个人创造社会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的过程。”^[13]文艺社会学强调对文艺进行社会控制,其中就包括对作家队伍的管理控制。文艺的社会控制是指社会对文艺信息传播的限制,它包括从文艺创作、传播到感受的整个过程。这种控制不是机械的人为操作或政治压制,而是社会本身的一种功能上的实现。因为“作家、艺术家通过作品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人生,并以此影响社会和人生,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凡社会行为,都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14]

“作家、艺术家、编辑的社会规范,既是他们专业社会教化的结果,又是他们行为的准则。这种专业规范不仅包括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界定标准,还包括文艺创作的社会性质、社会使命、文艺家的艺术道德、情操、审美理想以及一大堆关于文艺创作理论、知识、方法、技巧等方面的训练。他们在这些社会规范的教化过程中,一方面作出了常人的感情牺牲,另一方面又学会了从专业规范上看问题,建立起了特有的专业参考系统,即文艺观,从而决定他们对不同文艺作品的价值取向。”^[15]

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对作家的创作加以规范引导。这种规范引导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要在提高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上,让他们承担起用文学作品教育人、鼓舞人的责任。在创作新的红色经典时,要求他们不断创新,提高红色作品的艺术性,使当代能出现更多的经典性作品。同时,在改编红色经典时,力求真实于原著而不至于随意恶搞。当作家把个体创作当成一种全体性的责任时,红色经典教育才能显示强大功效。

参考文献

- [1][5][10][13] 鲁洁主编.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 [2]王春艳.红色经典研究综述[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1).
- [3][6]曹建文.红色经典不容“恶搞”[N].光明日报,2006-8-10.
- [4]谈谷铮.当代西方青年文化价值趋向[J].青年研究,1986,(4).
- [7][8][9]乔治·里泽著.麦当劳梦魇——社会的麦当劳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 [11]王斯敏.让红色经典回归中小学课本[N].光明日报,2009-3-13.
- [12][14][15]司马云杰.文艺社会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曾 艳